「采药昆仑」疑云

□ 本报记者 周学泽

文化观察

编者按：

日前，《光明日报》发表《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界和网络上截然分成“两派”观点：一种认为石刻为真，一种认为石刻为伪。“两派”观点互不服气，引发众多关注，为此，记者采访有关专家，力求解疑释惑。

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解读了青海省玛多县一块古代摩崖石刻题记的内容。

文章中称，青海省玛多县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区最大的两个淡水湖，近期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石刻题记。该石刻所镌字体为秦小篆，内容为：“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士/采藥昆/崙翳以/廿六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一百五十/里。”大意是：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他们于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到达此行的终点）。

文章认为，该石刻内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解决了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昆仑”“河源”的精确地望问题。当年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原内地使团之行，也实证了隋唐时期的“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时期已经打通了最为关键的环节。文章发布后，众多学者、自媒体人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整体风格之辨

上述文章发表后，6月10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表示“一眼假”，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制造＜昆仑山铭＞》说：“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但只有观点，没有论证。6月14日，他又发布《看看真正的秦始皇刻石是什么样》，依然没有文字，但列举了琅琊石刻等图片。

辛德勇着墨不多，但意见很明确，就是从整体风格和形制来讲，青海石刻和秦代皇家刻石差别很大。从琅琊石刻等“秦七刻石”来看，秦代刻石界面确实极为讲究，体现出秦人对铭字立传的严肃性，而青海刻石用小篆刻在粗糙不平、坑坑洼洼的天然石壁上，文字书写的刻意求工与石材处理的粗枝大叶很不相配，仿佛是“到此一游”式的涂鸦。

6月12日，记者采访了山东一位资深石刻研究专家，他表示，就目前提供的图文信息来看，青海“采药昆仑”石刻是否与秦始皇有关，有一些疑点需要排除才能断定，比如，文风问题，一般的秦汉石刻内容，很重视渲染气氛，往往以“兹事体大”的姿态，先从宏大叙事出发，绕一圈再回到本来要说的事，但谈到要说的事，往往说得又不是很具体。著名的“秦七刻石”，基本都是这种风格，比如山东邹城峄山秦代刻石，前半部分刻144字，赞扬秦始皇的正义战争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给百姓带来的好处，后半部分刻79字记录了李斯随同秦二世出巡时上书请求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刻诏书的情况；青岛黄岛琅琊台遗址的琅琊石刻也是如此，先是说“端平法度，万物之纪”，在“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等国家大事上绕一圈，歌颂秦始皇的圣明和伟大业绩，最后才绕到“乃抚东土，至于琅邪”。

这位经验丰富的专家认为，如果青海“采药昆仑”石刻，是秦始皇派出的采药队伍所刻，是国家行为，皇家所为，依照秦始皇好大喜功的特点，不会草率从事，目前石刻是在一个山岗上，文字叙事简单直露，无铺垫，和一般的秦汉石刻风格不一样，不合常理。

不过，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则认为，“先从文字看，我觉得昆仑刻石的文字时代特征明显，风格统一，看不出什么破绽。”“从文本看，文字简洁，语法规范，‘皇帝+使+人名’‘五大夫+臣+人名’‘将+人名（或职官名、书名）’‘采药+地名’‘以+年月’‘车到此’等简洁准确的表述，与传世秦汉文献中类似的文句对比，毫无违和感。”

也有观点认为，当地环境恶劣，冬季长达半年以上，属典型高寒气候，石刻草率为“到此一游”的记事行为，也不是没有可能。

文字细节之辨

石刻核心问题是内容中的断代问题。西北大学教授曲安京指出，“（皇帝）二十六年三月己卯”与这一年启用的《颛顼历》不符合。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也发文表示：“《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灭六国，始议帝号，称皇帝。这块刻石称五大夫（秦始皇）廿六年三月到达河源，元代都实奉命探河源，四月从临夏出发，经4个月方到达河源，以此类推秦人出发，最晚当在始皇二十五年的冬天或者秋天，此时嬴政还没有称皇帝号呢！远在黄河源的五大夫，是如何提前预见到秦始皇称皇帝的？秦代方士早不去晚不去，为何专门挑寒冬天气上路去河源采药？”

来自山东济宁的“求是斋主”6月11日在“求是斋杂谈”公众号撰文指出，这可能是不了解秦代的历法。秦代以十月为岁首，虽然《史记》记载是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的，但据后人考证，其实早在秦昭王时就已经实行以十月为岁首的历法了。所谓以十月为岁首，就是以十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十月初一为一年的第一天。所以，秦王政二十六年，实际上始于上年的十月，二十六年三月已经是当年的第六个月了。注意，只是以十月为岁首，并没有把十月改称为一月或正月，十月还是叫十月，一月还是叫一月或正月（端月）。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组副研究馆员熊长云则有另外一说，“由于石刻文字本身的残损漫漶，仝涛识读为‘廿六年’的几个字，并非无可争议。”熊长云认为，“廿六年”或许为“廿七年”，或者为“卅六（或七）年”。“始皇卅七年，三月正有己卯。卅六年，始皇因荧惑守心等事，已预感时日无多。若是卅七年，始皇派使者前往昆仑采药，正合于其时心态。”而且他认为，“铭刻真，不必怀疑。”

刘宗迪还认为，“昆仑采药”一词来自2002年在湖南里耶秦简发现的“琅邪献昆陶五杏药”，并以此质疑，此为当代人见秦简之后去青海伪造石刻。早在2020年7月，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侯光良便已在田野考察中发现这处石刻，此质疑不攻自破。

学者胡文辉从语文学角度提出，石刻中使用的“采药”一词，现在看起来是古代的词汇，但实际上并不见于先秦乃至西汉的文献。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在官方公众号“古文字微刊”撰写文章《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指出：“胡文辉先生说‘采药’一语不见于西汉以前典籍，这没错，‘采药’一语从东汉开始才逐渐增多，但是既然《史记》中有‘采芝药’，不管‘芝’是限定‘药’的，还是与‘药’并列，都说明当时的语言环境中是可以有‘采药’之说的。”

在辩论中，“采药昆仑”石刻文字进一步明确或有别解，比如，有人认为，“方士”应为“方支（技）”，因为“方”下面的残缺字，上面一横是弯曲的，即字不是“士”可以肯定；“行”，一些人认为是“兆”字。还有观点认为，古人“一百”这种表述十分罕见，“一百”一般省略为“百”，这说明“一百五十里”的“一”，有可能是“二或三”。

自然风化之辨

青海“采药昆仑”石刻辨别真伪，最应该辨别的是今天的石刻状态是否符合两千年来的自然风化特征，因为文字书写形式、内容、日期、历法等问题，莫不建于此基础之上。

从石刻文物本体角度来看，针对学者专家提出“此秦代昆仑石刻文字字口与岩石表面石皮色差大，不符合二千多年风吹日晒雨淋风化的特征”，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考古专业副教授、石刻研究专家张明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看过“昆仑石刻”高清照片后，综合多年野外考察碑刻经验认为，从字口、包浆以及风化程度来看，该刻石完全符合鉴定界所称的“开门老”特征，“绝无今人仿造的可能”。“仔细观察可见，字口与壁面已自然融为一体，并长覆了一层高原地衣。此外，刻字之后岩面又出现了多次风化断裂，这些裂隙的形成均晚于刻字时间。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字迹形成年代非常古老。”

张明悟表示，关于刻字风化程度，许多人常以想象来推测秦代刻字的状况，然而，若参考全国各地的汉代摩崖石刻以及巴基斯坦洪扎河谷的北魏刻字，会发现很多字迹至今仍非常清晰。

6月12日，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相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没到过现场，仅看图片不能辨别真伪，但希望可以考虑借助科学鉴定技术。青海“采药昆仑”石刻如果是真的，那从秦始皇到现在已经2200多年，在如此海拔和气候条件下的长期风化，会在刻痕中形成一些深色的风化物，通过鉴定技术，断定“采药昆仑”石刻的年代，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

此外，秦朝“地不过河西”，秦始皇是否会使人跨过国界采药，也有不少质疑。秦帝国的西界，就是陇西郡西界，没有超出长城一线太远。《史记·大宛列传》明确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这表明司马迁写《史记》时，汉人还不知道黄河源出青海，遑论秦始皇时期。当时秦人去河西采药，属于冒险行为。

6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龙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因为没有亲眼看见，对当地的地形地貌以及石刻本身没有太多了解，不敢轻下结论。但坚信这次考古工作者不会造假，其他人造假的目的性也深为可疑，如果石刻真是造假者所为，其水平也相当了得！但是，正如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言，其具体细节以及文字反映的历史问题可能还有可商之处。

我省古籍数字资源平台正式开通

□ 曹景年

山东省古籍数字资源平台近日正式开通，这是古籍整理界的一件大事。目前省级的古籍数字资源平台并不多，只有江苏、云南等少数几家。山东省古籍数字资源平台的开通，算是在全国古籍数字化集成建设中走在了前列。虽然上线古籍数量还不是很多，但从其资源内容、功能配置等方面，均可以看出其具有多方面值得关注的优点。

首先，资源集成化。近年来，古籍资源在网络上大量公布，让人目不暇接。这些新公布的资源大多数是各个古籍收藏单位的自发行为，这导致各家建设的古籍平台非常分散，质量不一、功能各异，使用起来非常不便。有些图书馆早已公布了很多资源，但由于信息流通不畅，很多人并不知道。所以，建设一体化集成式的古籍资源平台，将各家资源汇总到一个平台上供读者使用，就非常有必要。此前，已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做这项工作，如李飞跃教授主持建设的“全球汉籍影像开放集成系统”，将目前已公布的各家资源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检索平台，通过这一平台的检索可以立即定位到资源的所在位置。又如上海图书馆建设的“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是一个古籍目录的综合检索平台，通过这个平台的检索，可以获知一部古籍今存多少个版本，各藏何处。省级古籍资源集成平台，是将一省的古籍资源通过一个平台集中公开，这样的形式提高了效率，方便了读者，也避免了各藏书机构的重复建设。山东是古籍存藏大省，收藏了一大批珍贵的古籍资源。山东省古籍数字资源平台目前汇集了省内十四家藏书机构的资源，未来还会持续增加，将成为展示山东丰富古籍资源的首要窗口。值得一提的是，该平台不但收录公藏机构的资源，还创辟私人收藏一类，著名学者、收藏家收藏的古籍资源，也可在该平台公布，进一步扩大了古籍资源的来源。

其次，内容优质化。山东省古籍数字资源平台有非常明确的建设目标，那就是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资源汇聚一堂，公之于世，这就抓住了古籍资源的“牛鼻子”，优先、重点公布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古籍资源供人们使用。目前，该平台已公布首批古籍400余种，近5000册，其中就有宋版书4部，元版书11部，明版书157部。像宋版的《王安石文集》《朱熹文集》，都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重要文献，将其公开，惠泽学界良多。另外，该平台还公布了两部重量级文献，即明初编刻的《永乐北藏》和《永乐南藏》，这两部藏经都是中国佛教文化中的重要经典，具有极高的宗教、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会有更多的珍贵古籍展现在世人面前。

第三，功能人性化。古籍资源平台，不只是公布资源，更重要的是要从读者角度考虑，为读者提供更舒服、更具人性化的服务。就初步使用体验来看，该平台在设计上非常人性化，对读者非常友好。例如，该平台集阅览、检索功能于一体。一般的古籍资源平台不具有全文检索功能，仅有目录检索，而该平台则不但公布古籍影像，更是将其内容数字化，实现了全文检索的功能，这一功能目前在绝大多数古籍资源平台都没有实现。对很多数据库来说，全文检索功能都是收费的。从这一点看，山东省古籍数字资源平台确实走在了前列。又如，该平台公布的古籍页面为彩色图像，干净整洁，内容清晰可辨。这一点非常值得称赞。有些机构公布的古籍资源往往会打上水印，影响阅读体验。还有一些仅公布黑白图像，有的还非常模糊，根本看不清。再如，该平台书籍信息标注准确全面，对一部书完整标注了书名、卷数、责任者、分类、版本、收藏地，以及珍贵古籍名录号或古籍普查登记号等，这些信息对读者的学习、阅读和研究非常重要。比如收藏地，如果不标收藏地，读者就不知道这部书藏在哪里，引用时也缺少藏地信息，还需要查阅其他资料补充。还有一点，该平台在阅览模式中不但有各卷的目录，更有各卷下的二级篇目目录。有的古籍平台只把一部书公布出来就完了，没有任何目录，读者要查找其中的内容，需要自己一页页去翻，如果一卷或一册篇幅很大，就非常耗时耗力。有的制作了目录，也只是卷次或册次目录，而该平台则将目录详细到卷之下的篇次，非常方便学者的查阅。

总而言之，通过山东省古籍数字资源平台，我们看到了古籍整理和古籍数字化中的新成果和新风气，希望这一平台进一步充实内容，为古籍资源传承保护和利用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泰山青年学者）

取法经典，书写经典

——李建军金文书经典赏析

□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

一支笔、一方墨，一张纸，不仅是中华美学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人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籍书法家李建军致力于将金文书法与传统经典相融合，取法经典，书写经典，尝试将传统文化艺术融入现代生活日常。

金文：往者虽旧，余味日新

金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先民认识世界记录世界的重要工具，因为孕育在人类文明早期，金文采用象形描摹方式，这使金文造型有图画性质。刘勰《文心雕龙》有言：“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一个个金文，像一幅幅抽象的画，随物赋形，大小得体，形态生动。先民朴素的审美观和造型能力，让金文天生具有一种浪漫气息，备受后世关注。

金文书法如何窥见门径？李建军选择以经典为师。书法就是书写的法度，“法”不是一蹴而就的，有追寻的依据、有审美的高度，才能称得上书法。李建军由临商周金文原碑入手，花大力气临写散氏盘、毛公鼎、石鼓文等，从最经典的钟鼎铭文中体会金文技法，领悟金文风采。

在对经典的研习中，李建军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书风。他的金文字体饱满浑厚，质朴而自然。同时，他还尝试把小篆的技法带入大篆书写中，试图把大篆的结体奇巧与小篆的线条灵动结合。总体来看，他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了“有意味的形式”。

书篆：书法家应该像朝圣者

金文书法的不易之处，更在于必须具有识篆、择篆和书篆三种素养。所谓识篆，属于学术方面，要坐得住冷板凳研究学问，明辨是非、识别对错；所谓择篆，既属学术又属艺术范畴，在慧眼识珠中往往带入个人情感和喜好；所谓书篆，则纯属艺术范畴，没有是非逻辑之论，只有高下境界之说。因此篆书者必须具学问、见地、才能于一身。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金文书体一般称为大篆或籀书，存在一字多义、一义多字、一字多形、多字一形等现象。东汉以后，金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从实用性的角度说，成了一种“死亡的文字”。要记住已经不使用的生疏文字，本身就是一道难题，更何况要烂熟于心。因此，进行金文书法创作，需要以毅力和韧性，去进行古文字学的研究。一方面，要对甲骨文、金文、隶书等文字形体娴熟掌握；另一方面，对训诂学、音韵学和文献学也要有所涉猎。同时，还要关注新出土的古文字材料，才能为金文书法创作及时补充新能量。为掌握金文书法精髓，李建军下了许多苦功夫、笨功夫，同时也在学习积累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

当然，要真正写好书法，光有“术”是不够的，必须理解和掌握书法的“道”。中国哲学所讲的天地之“道”和“艺”是相通的。中国艺术中这种“以道为艺”的本体思想，使中国艺术理论和中国哲学理论密不可分，成为理解书法艺术的一大关键。因此，古人论书法便说“书之气，必达乎道”“书之妙道，神采为上”。

李建军认为，中华文化能够数千年延绵不绝并傲立于世，语言文字的有效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字是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它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两创”，汉字更承担着重要责任，所以书法家应该像朝圣者，去传播思想的种子，寻求信仰之火焰。

弘道：有时代特征的诗性表达

何以弘道？李建军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经典。在世界文明史上，各民族都有作为其精神信仰的经典文献。中华文明的经典，如《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反映了中国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如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由此形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从这些重要文献中，可以了解“我们是谁”“我们中华民族是怎么来的”，保护它、研究它、传承它，对后世子孙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李建军认为，金文这种古老艺术形式，尤其适合表现中华文化经典的内容，故而他决定对经典进行梳理、书写。开始多是书写一些古代诗词和名言警句，他觉得儒家崇尚的君子人格，对当代人仍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他书写了大量散见于《易经》《礼记》《论语》《孟子》以及历代文人墨客诗文中论君子的名言。后来，为了丰富书法作品的内涵，他又用篆书来书写历代美文，包括《出师表》《秋声赋》《桃花源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赤壁赋》等。再后来，他开始系统地创作，这些作品陆续结集出版，已经形成了一套“李建军金文书”体系。

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可以强化具有时代特征的叙事表达或诗性传递。如此，书法作品才有生命，才有魅力，才有根基。在书法作品中，李建军并不单纯追求对书写技巧性、娴熟性的展示。看得出，他更注重把握经典的精义、要义，在书写之时，他有意无意地受到经典的影响。

用金文书写经典，既有历史的亲近感，又有较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体现出了书法艺术的综合性，以及古今之间的特殊“黏性”。经典，经得起不同角度不同方式的萃取与阐释，如居环中，以应无穷。推进文化“两创”，需要调动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以多渠道、多样化创新的表达形式与途径共同推动。回望书法史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转化”和“发展”形态。站在新的历史维度，从传统经典与一切书法资源中寻找文化与精神支撑，对当代书法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思考，开展具有传统力量支撑的艺术探索与建构，才能使书法艺术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7-0001 邮发代号:23-1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 邮编:250014 发行电话:4006598116 报价全月45.00元 零售价:3.0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开机4:20 印完7:5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